

# 推薦序

董橋

張大千題畫詩名句十四個字：「花到夷方無晚節，仰人顏色四時開。」有些花卉也許真的不講氣節，到處開花討人歡喜。張宏艷和她筆下的人物不一樣，情願放棄夷方舊地遠赴祖家大陸追求心靈的安頓。她筆下的故事教我想起當年我從南洋回台灣讀書的心情：執政是政黨的作為，鄉土才是百姓的依戀。

張宏艷真會寫。寫她父親母親的顛沛寫的是老輩人的原則，寫她自己的渴思寫的是年輕人的無悔。往深處看，她這部書其實是海峽兩岸三地歷史長廊上的笑聲和淚影，角度新穎，寄托深遠。難得的是她寫得那麼瀟灑，那麼爽朗，一步一個腳印，讀了教人安心。

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：具有版權的資料

## 餐桌上的旅途

生於印尼華僑家庭，長於香港，有一種微妙感覺，與非華僑的香港人似乎生活在兩個平行時空。小時候，附近的街市開了一家印尼土產食品小店，母親知道了，興致勃勃地帶我一起買菜，回家興奮地宣布：「我們今晚做『加多加多』！」

Gado-gado<sup>1</sup> 是一道很常見的印尼料理，把蔬菜例如芽菜、馬鈴薯、青扁豆等等用開水燙熟，加入煎香的花生及沙嗲醬混合的醬汁，配上炸蝦片 (Kerupuk)，即成一道充滿印尼風味的美食，父母倆吃得甚為開懷。這是他們在印尼的美好回憶。

---

1 Gado-gado 是一種把蔬菜、豆角、炸豆腐等，與特製的沙嗲醬混合而成的印尼爪哇島料理。有時被稱為「印尼沙拉」，但味道與西式沙拉完全不同。

不久，母親又去街市尋寶，這次買了韭菜、豬肉碎，回家加入炒香的蝦米，全部切碎成為餡料。然後兩母女在廚房坐下，一手拿著水餃皮，一手用筷子加入餡料，以手指輕輕蘸水捏緊，就成為圓鼓鼓的餃子。手製餃子，是她在北京生活二十多年留下的痕跡。

有趣的是，我們來了香港幾十年，母親對於廣東菜仍未十分掌握，而且一直不懂煲湯。直到我去朋友家吃飯，嘗到別人的「老火湯」，仔細請教了烹調方法，才回家親自下廚，教家母用甚麼材料、如何煲湯。

餐桌上的美食，是每個人心中最深刻的文化記憶，母親的料理有如她的人生旅途，跨越廣闊的時空。

## 與父親對話

寫作這本書，是漫長的經歷，中間竟然過了30年。腦海首次浮現念頭，想把印尼華僑的事情寫出來，是來自近30年前與父親的一次對話。

在上世紀90年代，我前往日本留學，在大學藏書樓的珍藏中文典籍中，讀到很多熟悉的字眼，漸漸開始了解「華僑」這兩字背後的歷史淵源。我的雙親並非土生土長的香港人，而是生於印尼、居於香港，自稱為「華僑」。他們對往事鮮有細談，我也未曾細問。

在閱讀不少參考書後，我方知1950至60年代，成千上萬的華僑蜂擁回國，有如一波熱血澎湃的巨浪，將無數燦爛年華的青年送上遠洋輪船，隨著碧波綠水駛進即將展開文化大革命的中國，航向未知的命運。那些充滿理想的青年揮手與父母道別，怎料到從此天各一方，幾十年間難以再會？

了解得愈多，我心中的疑問也愈多。回到香港後，請教父親：「當時船上一別，從此與家人天涯海角，輾轉流離。你後悔這個決定嗎？」

「不後悔呀，如果不回國，我連讀大學的機會也沒有。」雖然歷盡波折，他語氣卻十分平和，「可以學中文，可以讀大學，這正是我想做的事。」

「在那個時代，輾轉經歷不同的社會，在印尼被視為外人，在內地被視為外人，在香港也被視為外人，幾個地方都格格不入，難道不覺得很委屈嗎？」我問。

「可是我有機會念書呀。」他仍然沒有半點怨氣。

當時不太明白他的意思，我心想，將來有機會時必須把華僑的故事寫出來。但生活中有諸多目標，我忙著工作、子女和其他事務，始終未能製造「機會」。

## 與叔公對話

然後，在2014年一次晚宴上，遇到叔公，他心情大好，笑著說：「來，喝一杯，慶祝我和妳媽回國60週年！」

我驚訝道：「已經60週年！時間怎麼過得這麼快？」

我抬頭看看四周客人，叔公、父親、母親、舅舅等人，都是有著同樣流離經歷的人。家中舊相冊裏的黑白照片，凝結了他們十多二十歲的追夢歲月，可是他們很少談及自己的過去。那麼，他們的青年時代究竟是怎樣的呢？

我好奇問：「你們當時乘搭同一艘船回國嗎？」

叔公記憶猶新，對各種數目和年份都記得一清二楚。他坐下來，談起60年前的事：「那是1954年，我從印尼乘上了開往中國的遠洋輪船。新中國建國不久，我當時只有21歲，妳母親快滿16歲。我們和其他三百多位『進步青年』一同上船，一同回國，感到無上光榮。」

「你只有21歲，母親也還未成年，就由你帶著她一同回去嗎？」我問。

「就這樣呀，雖然我年輕，但畢竟是她的長輩，可以互相照應。不少人都是隻身遠行的呢。」

1954年6月22日，這個瘦弱小夥子，帶著姪女和幾箱行李，在棉蘭勿老灣上船，展開一星期的海上航程，航向他們自出生以來從未見過的祖國。

當時印尼與中國並無邦交，他們為了獻身建設新中國，出發前簽署了一份印尼官方文件，宣誓自己單程進入中國後不再回來，走上不歸之路。

這是我第一次聽叔公談起他的經歷。腦海裏那個隱約而微小的願望又再浮現，必須把華僑的故事寫出來。二十多歲的青年，如今已變成七、八十歲老人，此時再不寫，恐怕會太遲了！

### 三十年後，與父親再對話

於是，我開始訪問身邊的華僑，從叔公開始，再訪問父母以及其他親人，又飛到印尼訪問華僑。

2014年尾，與父親坐下詳談，他娓娓道來，我則做筆錄。「愛國」兩字在他們年輕時，比今天的「民主」更高尚、更英雄、更浪漫。

「你未去過中國，怎會愛上一個從未去過、未見過的國家呢？」我問。

「我們在印尼的華僑，大部分都非常愛國，送子女去左派學校念書，我也是念左派中學呀。」他說。

學校播放很多愛國歌曲，派發愛國畫報，宣傳美好新中國。他印象最深的一首歌，是〈邊疆的泉水清又純〉，腦海中的美好新中國與動聽的旋律一同縈繞心頭。他隨想地憶起往事，我不斷提問，寫下重點，包括當時的中學教育、華僑在印尼社會的地位，以及回國後如何重新接受中文教育。

他經歷了我想像不到的波折，但講述起來心平氣和。在艱難的生活中，他總找到平淡快樂的小故事。韶華如露，似水流年，一切血腥、鬥爭、生離死別，經過時光沉澱，只有餘音裊裊的記憶。

談了近一小時，他閉上眼睛，「我很累了，要休息了。」此時，他的腦退化加重，耐性也變得有限，難得斷斷續續談了不少往事。

我笑說：「好呀，今天談了很多，下次再訪問你吧。」

於是，我繼續訪問身邊的親人，原本打算問完其他人，再請父親補充一些不明白的細節。

我原以為他會一直在。

然而，他的病情漸漸惡化，不久已經無法自理，表達能力也漸漸喪失，常常有錯覺，如夢似醒。幾個月後，不幸感染併發症，病情急轉直下，慟於2015年去世。在他離世前後的很長一段期間裏，我忙於照料家人和處理後事，母親也開始出現輕微的腦退化。我與父親對談的訪問稿，一直放在抽屜中，無暇理會。

此時，我才醒悟，那次唯一的訪問是父女倆罕見地細談往事的珍貴時刻。

## 離散與尋根

最近重拾書稿，仔細回看他們離散的經歷，感慨萬千。香港目前也正面臨很強烈的一種離散氛圍，許多人為了未來而與親友告別，選擇移居別處。

離散，是個人的人生選擇，為了更美好的生活，投入未知的社會。不同年齡的移民，面對不同的難關和挑戰。回首印尼華僑的人生旅途，少年時心懷理想，投入回國建設的大潮流。人到中年三、四十歲時再投入另一個新環境，實際境況可能與當初的想像完全不同，憧憬化為泡影，為了生活，只能沉著應對。

印尼華僑本是生於異鄉的華人，為了尋找精神上的文化根源，又為了避開社會動盪，有如浩瀚大潮，紛紛離散。如果說他們的流離故事有甚麼地方能讓現在的香港人借鏡，那就是在陌生的土地上，如何面對逆境，找到安心的家園。

移民海外的第一代，對於自己出生地的故鄉文化，總是難捨難離，覺得目前只是「寄居」他方，難以完全融入，也不想拋棄自己以往的一切。生於海外的「第二代」華僑子弟，成長於當地社會，腦海沒有父母的故鄉，卻更為好奇，更積極尋找自己的根源。

也許，每個家庭都有離散，然後轉了一大圈，下一代再回去尋根。到了最後，不論外在環境如何，最重要是身邊有同行的家人，一同面對心中難以形容的鄉愁。

我們總是感嘆失去的，卻忘了珍惜所擁有的。願每個人都珍惜當下，不論身在何方，最值得珍惜的，是不離不棄支持自己的家人。

我要感謝所有曾經接受訪問的親人及華僑朋友，部分受訪者只想低調分享，因此本書的內容以我第一身的感受寫成，部分受訪者的姓名隱去，部分訪問內容只作為參考資料，沒有寫出來。

感謝棉華中學香港校友會的鄭福蒸先生，多次提供寶貴資料，並介紹不同的印尼華僑校友分享經歷。鄭先生對於歷史事件的提示，讓我更清晰了解華僑的事跡。

感謝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社長甘琦女士。有賴她的支持和鼓勵，讓我有機會將這份訪談稿重見天日。

感謝葉敏磊博士的指導，我一直為文章的形式和照片的處理而煩惱，若沒有葉博士的引導，本書的概念無法成形。

感謝冼懿穎女士的深厚編輯才華。若非冼女士的耐心編排、仔細編輯及指引，本書不可能如此美好地面世——事實上，比我想像中好十倍。

幸得出版社幾位才華橫溢的朋友從旁鼓勵，這本書才能得以完成。你們無法知道，你們的支持對我而言是無限的力量。

謹以此書獻給所有經歷過悲歡離合，在逆境中自強不息，找到安心家園的人們。